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

# 硕士学位论文

题目 论社会主义时期  
毛泽东对教育改革的探索

作者 杨迺立

专业 中共党史

1990年 8月30日

---

所 在 单 位  
(本校生填教研室) 第三军医大学政教室

指导教师或推荐  
人 姓 名、职 称 \_\_\_\_\_

学 习 期 限 1985.9 - 1987.7.

## 论社会主义时期 毛泽东对教育改革的探索

教育战线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是一个很重要的领域，是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重要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的发展，倾注了毛泽东同志的不少心血。他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对教育的改革作了广泛而深刻的探索。他的教育探索活动对我国教育的发展，发生了深刻的影响。

因此，研究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时期的教育改革的探索问题，不仅对研究毛泽东这一历史人物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拓宽中共党史的研究领域也具有重要意义。

毛泽东以后，我们正面临着又一次全面的教育改革。改革呼唤着新的教育理论。因此，回首建国以来我国走过的教育改革的道路，尤其是深刻地总结毛泽东同志在社会主义时期对教育改革探索的经验教训，对新的教育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无疑是一项“基本建设”。

对于毛泽东思想的研究，目前大多集中在他的早年和民主革命时期的研究，对于社会主义时期他的教育思想，由于资料等方面的原因限制，缺乏系统的研究和阐述。本文仅就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时期对教育改革的探索谈点认识。

### 一、毛泽东教育改革探索的艰辛、独创和曲折

新中国教育制度的确立和发展，为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时期探

索教育改革之路提供了有利条件。

从1949—1956年，是新中国凯歌行进的时期。在教育领域，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了一项把旧的学校教育改造成为新民主主义教育的巨大工程。1949年12月，教育部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确定了全国教育工作的总方针，明确了改革旧教育的方针、步骤和发展新教育的方向。此后，全面展开了对旧教育的改造。到1956年止，创建新中国教育的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第一、接收了旧中国的所有公立、私立、教会学校。接收全国私立小学8925所，接收私立中等学校1412所，接收私立高等学校84所，公立高等学校100所左右，教会学校21所。高等学校大体上在1952年就完成了接收工作，中小学到1956年完成。这样，教育大权就全部掌握在人民手里，彻底结束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教育性质。第二、确立了党对教育的领导权，坚持了学校向工农开门，培养工农出身的新型的分子的原则，从1950年暑假开始，每年招生对工农子弟都作了“从宽录取”的规定，1951年起就陆续招收产业工人和革命干部入高等学校学习。同时，举办各种工农速成中学和各种高校预备班，为工农入学创造条件。另一方面，对旧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运动，使广大教师划清敌我界线，批判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而且，在高等院校取消旧教育的反动课程、反动的训导制度以及宗教课程，开设了马列主义的政治理论课程，大力进行了课程改革。这一系列的措施，确立了共产党对教育的领导地位。第三、明确了教育为社会主义建设

服务的方向。为了使教育与社会主义建设同步的协调发展，从52年到53年，在各主要高等院校进行了院系调整。同时，中央还规定了高等学校统一招生和毕业生统一分配的制度，把教育事业完全纳入了国家计划的轨道。上述成就的取得，为毛泽东进一步的教育改革探索铺平了道路。

毛泽东社会主义时期教育改革的探索，严格地说，是从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以后开始的。毛泽东同志从51年到他逝世的将近20年的时间里，从未间断过对教育改革探索的努力。其间有三次探索的高潮。

#### 1. 57、58年的探索

57、58年毛泽东开始探索教育改革的课题，原因有二：首先，57年以后，毛泽东在认真考虑摆脱苏联的建设模式，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而教育，作为整个探索很重要的一部分，自然成为毛泽东探索的一个重点问题。

其次，新中国教育的发展所暴露出来的问题迫使毛泽东进行教育改革的探索。由于我们在创造新中国教育的过程中，学习外国的特别是苏联的教育经验时，没能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致使教育明显暴露出两大问题：一是在教育中忽视政治思想教育，二是忽视了劳动教育。这两大问题的出现，严重阻碍了新中国教育的继续发展。这说明新中国的教育迫切需要改革。

毛泽东同志从50年代中期开始，就不断批评在学习外国中出现的简单照搬，不结合我国实际情况的教条主义倾向。1956年1

月25日，他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我们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我想是提得对的。”“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能学。”（《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40页）针对学校忽视思想政治工作这一问题，他又是作报告，又是写信加以强调，要求予以重视和加强。（见《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3、17毛泽东给周恩来等同志的一封信）

学校忽视劳动教育的状况，在当时更为突出和严重。致使许多学生缺乏劳动观点，鄙视体力劳动。这些人只想升学不愿意劳动就业。对此，中央多次下发文件，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多次在各地发表讲话，报刊连续发表社论文章，电台举办特别节目，号召青年学生从党和人民的利益的大局出发，愉快地投入到生产劳动中去。毛泽东也召集各省市的教育厅局长座谈教育问题。他认为学校出现忽视劳动教育，原因在于照搬苏联太多。他生气地责问教育领导部门，是中国的教育部还是苏联的教育部，他要求根据中国的情况，来探讨自己的教育发展之路。

这一次教改探索的主题，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教育与政治的关系；二是教育与劳动的结合。对教育与政治的关系，集中体现在他提出的两个著名的教育方针。1957年2月，毛泽东对教育界关于“全面发展”和“因材施教”的大讨论作了权威性的总结，提出了“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和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

动者。”这一方针的提出，标志着他独立自主进行教育改革探索的开始。联系教育界当时的状况，这时毛泽东提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方针，其重点在于“德”上。到了1958年，在全国的教育改革蓬勃兴起的情况下，毛泽东又提出了“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工作方针。在这个工作方针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作为教育的无产阶级性质的根本特征之一的，因而，实行教劳结合正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具体表现。这一方针，把政治与教育的关系说得一清二楚了。由此可见，这两个教育方针的精神实质是一致的。这两个教育方针的提出，统一了当时教育界、以致全党的思想，明确了教育鲜明的社会主义性质。毛泽东同志还提出，要贯彻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一教育方针，必须强调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

对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问题的探索，毛泽东的注意力大多集中在结合的“形式”上。他重点探究了半工半读、厂校结合的做法。他认为这是实行教劳结合的很有生命力的一种形式，是“新生事物”。他在视察武汉大学时，看到学生们实行半工半读，欣喜若狂，指出：“学生自觉地要求实行半工半读，这是好事情，是学校大办工厂的必然趋势，对这种要求可以批准，并应给他们以积极的支持和鼓励。”（摘自“毛主席视察湖北钢铁生产”，新闻报导，1958、9、21、人民日报第1版）他进而把这一思想推向纵深，从体制上提出问题，指出“以后要学校办工厂，工厂办

学校”(1958、8、19、《光明日报》),他甚至描绘出这样一幅蓝图:将来“学校是工厂,工厂也是学校”(1958、8、16人民日报)。在他主持起草的《工作方法(草案)》中,对中等技术学校和技工学校、高等工业学校、农业学校、农村中小学、大学和城市中学分别就办厂的问题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和设想。根据厂校结合的思想,毛泽东对农业大学办在城市里很不满意,在一次讲话中气愤地说:“农业大学办在城里不是见鬼吗?农业大学要统统搬到农村去。”(1958、8、17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 2.64、65年的探索

以64年初毛泽东在人大大会堂召开春节“教育工作座谈会”开始,他的教育改革探索进入新的高潮。

60年代初,随着国民经济的调整,开始对教育上的严重问题和理论上的错误予以纠正,颁布了《高教60条》、《中学50条》和《小学40条》,对政治运动、生产劳动、教育秩序、师生关系、政治思想工作等做了一系列的行政规定。由此也引起了对红专关系、理论与实践关系、教学过程和一般认识过程的关系、书本知识和实践知识的关系等重新展开了讨论。

毛泽东同志也用自己独特的方式,重新审视中国的教育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的主张。

这一次他探索的主题也是两个:一是学校与社会的联系问题;另一是教学内容、方法和考试制度的改革问题。

在传统的教育制度中,学校教育与社会是脱节的,与生产企



业部门是不联系的。儿童进入学校，如同进入一个脱离社会的封闭的场所。毛泽东反对这种把学生关在学校里，“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教育模式，主张学校应该敞开大门，让学生到社会中去，到三大革命实践中去，办“抗大式的学校”。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把书本知识和实践知识结合起来，才能把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才能学到真才实学。他认为现行学校教育应当改造，方向就是使学校和社会紧密挂起钩来。方法就是无论理工科大学还是文科大学，除办实习工厂、实验室以外，都应该“以社会为工厂”，让学生下去搞工业、农业、商业。“大学如果五年的话，在下面搞三年。”中学毕业生，毕业后“先做点实际工作，单下农村还不行，还要下工厂、下商店、下连队，这样搞他几年，然后读两年书就行了。”“教员也要下去，一面工作，一面教。”（1965、12、21、毛泽东在杭州的谈话纪要）

从这一思想出发，他逐渐对当时的教育表示不满。在春节座谈会前后，他认为当时教育路线还是对的，只是教学方法不对；64年7月，从他对毛远新的谈话中可以看出，他开始对学校的办学目的不满了，认为这种办学方法，脱离社会实际，“公开号召去争取那个五分”。8月，他在接见尼泊尔教育代表团时说，你们千万不要迷信中国的教育制度，不要认为它是好的。到了1965年底，毛泽东的这种不满扩展到了整个教育制度了。在65年12月的杭州会议上，毛泽东表示“现在这种教育制度，我很怀疑。……读了十几年书，越读越蠢。”之所以越读越蠢，他认为就是十

几年关门读书所致，对社会毫无所知，不知道工人怎样做工，农民怎样种田，商品怎样交换。

毛泽东对我国教育的看法的这种变化，其关键性的症结在于：他认为，大中学校的领导权这时大多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掌握，而由这些知识分子所掌握的学校不可能真正实现他所主张的加强学校与社会的相互联系的主张。正因为如此，他才决心通过“文化大革命”，来“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学方针和方法”，“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1966、8、8、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

这次探索的另一个主题是教学内容、方法和考试制度的改革。毛泽东教学改革探索的主要内容有三：一是课程设置要减少，学制要缩短；二是课堂讲授的方法要改变，主张启发式教学，不要满堂灌；三是考试方法，主张采用开卷或者讨论问题的方式进行。反对出偏题、怪题、对学生突然袭击。毛泽东进行教学改革探索的宗旨，是要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他教学改革探索的三个方面都是围绕这一宗旨展开的。当然，毛泽东强调能力的培养，并不是不要掌握必要的知识基础。相反，在这方面他也时有强调。

### 3. “文革”初期的探索

毛泽东对教育的探索是锲而不舍的。在“文革”期间，他亲自关注北大、清华的教育革命试点，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富有创见的教育主张，并且进行了有力的实践。最能体现他的基本教育思

想，并对教育革命发生重大影响的是这样三个指示，这也是他在这一阶段教育改革探索的主题。

《五七指示》是毛泽东建设新的社会理想的总纲，其中也包括新的教育世界的总纲。在《五七指示》中对教育是这样说的：“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既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1966、5、7、毛泽东审阅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给林彪的信）

实际上，这个教育总纲是将他在第一次探索中提出来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劳动人民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的思想加以具体化，希望通过学工、学农、学军与教学并存，通过批判资产阶级，确立无产阶级的教育性质，达到消灭三大差别，实现人人参加劳动和接受教育的共产主义理想境界。

另一个指示就是《七、三〇指示》，其内容为：“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来，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见《红旗》1966年第2期）毛泽东同志深深地体会

到，知识分子头脑中的一整套办学框框，不可能实现他的教育理想。只有依靠工农兵来管理学校，才能实现他的教育理想。在他看来，这也是教育革命的核心问题。

还有一个指示就是《七、二一指示》。(1968、7、21毛泽东在《人民日报》关于《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调查报告)》的编者按清样中加写的一段话)“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人民日报1968、7、22)毛泽东的这一指示，从学校的招生制度、选拔制度、分配制度和培养方式上提出了新的设想。

纵观毛泽东对教育改革探索的过程，有以下几个显著的特征：

第一、毛泽东的教育探索是在非常艰难的条件下起步的，并受到我国现实国情的制约。

首先，毛泽东的教育改革探索受到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文盲遍地的沉重历史包袱的制约。旧中国的教育非常落后，适龄儿童的入学率只有20%左右。新中国建立后，接管了旧有学校，并进行了改造。尽管从1949到1957年我国的教育事业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各类学校的在校学生数由1949年的2500多万人发展到1957年的7100多万人。(《中国的昨天与今天》1840—1987国情手册第838页)但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烂摊子不可能只经过几年的发展就发生

根本性的改观。到1957年为止，据毛泽东的估计，仍有4千万学龄儿童不能入学(1957、2、14毛泽东接见全国学联委员时的谈话)。同时，文盲和半文盲的人数占全国人口相当大的比重。这使毛泽东的探索首先所遇到的就是如此多的儿童入学困难的问题和如此多的工农需要扫盲的问题。然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并非易事。建国初期我国劳动生产力很低，国家的物力和财力都很紧张，教师奇缺。这就迫使毛泽东要花很大的精力在扫盲识字、勤工俭学、半工半读上。同时，我国生产力状况的落后又限制了毛泽东很少在现代化建设与教育的关系方面进行深入探索。

建国后前七年的教育，从总体上来说，属于新民主主义的教育。49年的《共同纲领》中有明确的规定。这一特点决定了毛泽东的探索的艰巨性。它不仅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对教育制度中不完善的地方进行改革，而且是使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的教育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教育过渡的一场革命性的变革。这里，形成巨大反差的是：教育改革探索的历史任务是艰巨的，但毛泽东进行教育探索的思想和理论的准备又是不足的：马克思对未来教育的设想是非常原则的，那里没有现成的答案可寻；苏联当时的教育理论由于我们全盘照搬，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因而发生了不少问题；对旧中国的教育中的合理因素和资产阶级教育的合理因素我们又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对于教育的一般规律我们认识不足。因而，这就形成了我们社会主义的教育理论的“空白”，这无疑增大了毛泽东的教育改革探索的难度。

就毛泽东个人来说，他首先是一位政治家。他是站在政治家

的高度来探讨教育改革之路的。因此，他可以在宏观的层次上把握教育这个大系统和其他系统的关系，如教育与政治的关系，教育与社会的关系，教育与经济的关系以及教育与党的领导的关系等等。但就教育的微观方面，教育系统内部的关系方面的探索就显得很不足了。如教育的一般规律问题，各国教育的共同特征问题，教育中的心理学、社会学问题等等，这些在他的探索中几乎没有涉及到。

第二、毛泽东教育改革的探索对苏联的教育有强烈的超越意识。

在毛泽东的教育改革探索之初，我国教育界是普遍接受苏联凯洛夫的教育学理论的。凯洛夫是四、五十年代苏联教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教育理论，强调教育的阶级性。主张课堂教学是教学工作的基本组织形式，教师在教学和教育中起主导作用，教科书是学生知识的主要来源之一。他的教学观实际上仍然是以19世纪德国教育家赫尔巴特为代表的“传统教育思想”的“三中心论”。即以课堂为中心，以教师为中心，以教科书为中心。从57、58年毛泽东的教育改革探索来看，强调了教育的阶级性，强调教育要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这是一致的，但毛泽东对于“三中心论”的教学思想是不赞成的。他对学校教育的各种观点都是放在整个社会的大背景下来论述的。在课堂教学和从实践中学的关系上，在书本知识和实践知识的关系上，强调要从实践中学，在实践中增长才干，认为教科书上的知识是不完全的知识。

教师和学生在学习中谁是主体的问题上，他更强调的是后者，他认为这是在教育中贯彻群众路线的具体体现。尽管毛泽东在57、58年的探索实践也有些失误，但他提出的上述主张是有积极意义的。

实践也证明，统治苏联教育界几十年之久的凯洛夫的教育思想，在世界科技迅猛发展、新技术革命的强烈冲击下，已经远远不能适应现时代需要了。他的后果正如苏联学生所说的，“学校没有教给我们创造性、首创精神和独立性，甚至使我们缺乏大胆想象的勇气”，“我们没有勇气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而往往是依赖家长和教师。”“我们在学校里很少思想，而更多的是背书。”（蔡克勇《高等教育简史》，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2年版第118页）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毛泽东在50年代末的教改探索，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苏联教育中发现的这些问题在中国的重演，这是对苏联教育模式的突破。

继凯洛夫之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赞可夫的教学思想成为苏联教育界的主导思想，并且受到世界的瞩目。他成为六十年代世界教改潮流的代表人物之一。他针对凯洛夫教育学重视传授知识，轻视能力培养的弊端，提出在传授知识的同时，要培养学生的观察力、思维力和实际操作能力的观点。面对世界科技的飞速进步，知识量成倍增长，从而给教育领域提出严重挑战的形势，他提出了进行高难度、高速度教学，加大教材份量提高教材难度，使学生在较短的时间内掌握较多知识的教学改革。苏联这

次改革取得的成绩是值得肯定的，但确实也出现了许多问题，主要有：由于过份增加教材的难度和教科书厚度，学生的负担过重，影响身体健康；过分强调理论知识在教学中的地位，有脱离教学实践和生产生活实践的倾向；不重视劳动教育等等。

如果说，苏联五十年代末的教育改革与毛泽东在57、58年的探索，并驾齐驱，说明我们抓住了追赶世界教改潮流的历史机会的话，那末，毛泽东在64、65年的教改探索却在实实在在考虑如何超越的问题。就毛泽东的性格而论，追赶无足挂齿，超越才其乐无穷。苏联教育中企图依靠增加教科书的厚度和难度的办法不是解决社会知识爆炸的最好应策，因为社会知识量的猛增呈加速度的发展趋势，而教科书的厚度和难度却不能无限增大。毛泽东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在学校重视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使学生主动、大胆、高效、自主地接受新知识。他的这一改革思路较之苏联的教学改革设想前进了一大步，使学校不仅成为积累和传授知识的场所，更成为增加和创造知识的“前沿阵地”。

毛泽东洞悉苏联教改的弊端，在60年代的教改探索中强调要减轻学生的负担；保护学生的健康；强调生产、生活的实践对教育的极重要作用；以及使教育与生产劳动更进一步地结合。这一切说明，毛泽东在64、65年的探索，是站在世界教育改革的前头，兴利除弊，扬长避短来改革中国的教育的，表现了极强的超越意识和独立自主探索的勇气。

第三、毛泽东的教育改革探索，深受他的继续革命的“左”的



理论与实践的影响。

57年以后，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在思想上逐渐形成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而毛泽东的教改探索 and 这个理论的形成是同步进行的。因而他的教改探索也显现了这个理论的“左”的痕迹。在57、58年的探索中提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概念，把各级分类学校的教师当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成为改造的对象。这是在他的探索中出现“左”的偏差的开端；在64、65年的探索中，把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渗透到了探索的各个角落。从而错误地得出结论，认为学校的领导权大多数不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要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把权重新夺回到工人阶级手中；在“文革”时期的探索中，“左”的影响更是严重。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虽说是迟群、姚文元、张春桥搞的，但毛泽东是批示“同意”的。虽然在不久后毛泽东对《纪要》中的个别用辞提出了不同看法，但并没有对基本观点表示任何怀疑和否定。《纪要》把毛泽东同志在教育改革探索中的“左”思想作了系统化的阐述。并且成为“文革”后期办教育的总纲。

从实践上看，毛泽东的教育改革探索的成果受到了“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和肆意歪曲。“四人帮”一方面利用毛泽东教育探索的成果没能以完整的体系形式来表达，而仅是以谈话、批示、语录等形式出现的特点，任意曲解毛泽东的原意；另一方面，“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掌握和控制了教育大权，使他们有条